

蘇聯「國安會」在美國的情報活動

龍舒甲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約聘助理研究員)

一、前言

在蘇聯對外關係中，它的間諜活動比其他任何一國的國外情報活動都要來得頻繁。由於蘇聯的這種活動保持高度隱密性，所以外人不易充分地了解。但是，若對蘇聯駐外機構與情報的關係有充分的認識，那麼蘇聯對外活動也就易於理解了。

一般而言，蘇聯的領導階層對於西方的力量幾乎懷有恐懼，但對於西方的「邪惡」形象又總是予以誇張。自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敵對性被加深之後，現階段的「和解」乃是「偉大的」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因此，蘇聯領導階層永遠在加強各種情報工作，並主動地維持其龐大的國外間諜網。

蘇聯的情報組織要比其他國家晚到美國。一九二〇年代後期，蘇聯才開始直接從莫斯科支持和指揮它在美國的情報活動。在當時，它只是透過共黨國際的訪美人員及美共熱心份子等零星地從美國獲得機密資料。可是在很短的時間內，蘇聯在美國的情報組織迅速成長而有活力。

本文擬先檢視「國安會」(KGB)對美國造成的困擾；其次簡介「國安會」的領導人物及其第一總管理局的組織結構與功能；然後分三部份論述「國安會」活動的指導綱領：甲、在美國招募活動的原則，乙、招募活動發展的初步階段，丙、招募活動的發展。最後，試以一些案例來了解「國安會」在美國的活動機會。

二、「國安會」對美國造成的困擾

美國前國防部長溫柏格(Casper Weinberger)曾說：「蘇聯藉合法與非法手段所取得的西方科技已到了能動搖美國在科技方面所保持的領先地位，……蘇聯製造的SU—二七羅式戰鬥機和美國艦隊使用的主力戰機F—一五極為相似。……，這種技

術是從美國透過間諜獲得的。到一九九〇年代中期，蘇軍將會擁有許多美國武器製造商們所開發的技術。」^①蘇聯的這種秘密行動並非鮮事，但是在科技方面，莫斯科正在美國進行一種所謂的「綜合行動」，其範圍是從西岸加州科技資料豐富的公司到東岸紐約及華府的辦公大樓。^②

雷根政府曾下令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到一九八八年為止要減少三分之一人數。但在聯合國內却因美國這項命令之合適性而引發了一場法律上的爭論。的確，蘇聯的間諜活動已成爲雷根政府最關切的事項之一。而雷根的這項命令或將使得蘇聯在美國境內指揮間諜活動及招募美國人從事間諜工作的計劃會變得困難些。^③

的確，對大紐約市區只有一千一百卅五名情治人員來說，光要處理各種的犯罪行爲已經是捉襟見肘了，更何況再要聯邦調查局去監視兩百七十五名蘇聯代表團裏的外交人員、秘書、司機、女傭、警衛和門房，以及另外六百多名在聯合國內擔任職員、記者、貿易代表和導遊的蘇聯公民。^④

克里姆林宮之所以要盡一切可能取得西方先進的科技，在戰略專家們的看法是：蘇聯並無他法能夠趕上西方的軍事和經濟的力量。由於社會主義難以產生像西方那種普遍性科技發明的能力，所以唯有藉設法取得西方最先進的科技設計，蘇聯的領袖們才能在不妨鬆他們對其社會的政治控制之同時，享受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成果。^⑤

三、「國安會」的領導人物及第一總管理局的組織結構與功能

甲、「國安會」的領導人物

在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後不久，他的特務首腦貝利亞(L. P. Beria)曾將內政部(MVD)部長克魯格洛夫(S. N. Kruglov)及國家保安部(MGB)部長伊格納切夫(S. D. Ignatiev)免職，並重新合併這兩部於他個人控制之下。可是在貝利亞被指控爲「帝國主義間諜」並遭處決後，克魯格洛夫在一九五四年三月成了新改組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首任主席。然而克某剛上臺沒幾天，即死於心臟病，於是改由自一九四一年起擔任國家保安人民委員部(NKGB)副主席的謝洛夫(L.

註①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6, 1986, p. 17.

註② *U.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25, 1981, p. 39.

註③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14, 1986, p. 6.

註④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1986, Sec. 4, E3.

註⑤ 同註③·頁四一。

A. Serov) 出任國安會主席。①一九五四年四月廿八日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命令，該會直屬於蘇聯部長會議之下；並掌理戰略情報業務。②謝洛夫將軍曾是赫魯雪夫的老搭檔，也曾參與過秘密警察幾次最殘酷的行動，但在一九五八年的十二月上旬，却遭到免職。由謝列平 (A. N. Shelepin) 接任。而謝氏在任不到三年，又換上了謝米查斯特尼 (V. Y. Semichastny)。國安會在謝米查斯特尼的指揮下，曾犯了許多令蘇聯領導們尷尬的錯誤，如：古巴飛彈危機，對蘇聯航空部的控制等。因此，到一九六七年四月，就改由曾在一九五七年擔任過駐匈牙利大使的安德洛波夫 (Y. V. Andropov) 來掌握國安會。安某在位十五年，國安會所取得的科技情報對蘇聯科技的貢獻最大。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布里茲涅夫死後，在國防部長烏斯蒂諾夫元帥 (Marshal D. F. Ustinov) 及軍方的支持下，安某坐上了總書記的職位。③這時，國安會主席由費多秋克 (V. Fedorchuk) 來接任，在職僅七個月就被調任內政部長。國安會第一副主席契布瑞柯夫 (V. M. Chebrikov) 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升任國安會主席。④契布瑞柯夫於一九四六年入黨後，在烏克蘭擔任金屬工業部門的工作和黨務工作一直到一九六七年為止，被布里茲涅夫召到莫斯科負責國安會的人事。當一九八二年四月升任為第一副主席時，他已與安德洛波夫共事了十五年之久。一九八三年底，升為大將，並成為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補委員。⑤

國安會名義上在蘇聯部長會議之下，但實際上其主席直接對蘇共中央總書記負責及報告，而政治局也在許多案子上為國安會策劃重要行動，同時它還透過中央委員會的機關來監督國安會的日常運作。若是沒有蘇共中央相關機關的允許，國安會絕不能雇用任何人擔任幕僚作業。此外，無論是派遣國安會人員到國外，或是在國內分配任何人員與工作，亦得經由此部門的批准。這種緊密的政治性控制可以確保國安會的行動忠實地遵循統治階層所策劃的步驟。所以，國安會的任何重大行動絕不會被認為是未經授權的越軌行爲。⑥

2、「國安會」第一總管理局的組織結構與功能

註⑥ William R. Corson and Robert T. Crowley, *The New KGB: Engine of Soviet Power, Update ed.*,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 Inc., 1986), pp.246-248.

註⑦ 蘇俄簡明百科全書，國防研究院編印。(臺北：國防研究院，民國五十四年三月)，頁六五一。

註⑧ Zhores A. Medvedev, *Andropov*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84), pp.99-108.

註⑨ Brian Freemanle, *KGB* (New York: Innsledge Publication Ltd., 1982), pp.30-33.

註⑩ Alexander G. Rahr, *A Biographic Directory of 100 Leading Soviet Officials, 3rd ed.*, (Munich: Radio Liberty Research, RFE/RL, 1986), pp.46-48.

註⑪ John Barron, *KGB: The Secret Work of Soviet Secret Agents* (New York: Reader's Digest Press, 1974), p.73.

國安會分爲四個總管理局，七個獨立管理局及六個獨立處。另外，許多下屬單位也分別以不同性質或名稱的管理局、處、司、組來識別。

第一總管理局和軍事情報局（GRU）是共同負責蘇聯國外所有的秘密行動，尤其是在取得高科技情報方面，軍事情報局與國安會配合得極好。第一總管理局裏面大約有一萬名人員。另外國安會也雇用了一百四十萬以上的人，其中半數是屬兼職的線民，分佈於國內外各地。第一總管理局下設三個管理局、三個特別司、兩個特別處、十一個地理區處，和五個勤務處。^⑭從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七年，「A」處——偽情報處是由艾干效少將（Major Gen. I. I. Againts）領導，起初雇用了四、五十名人員，到一九六八年這個單位改組及擴編，更名為「積極措施司」，負責協調和計畫散佈「虛假的和煽動的情報」，藉以欺騙蘇聯集團以外的外國政府和大眾。^⑮

三個管理分局中的一個「S」管理局是負責外國情報或「非法業務」，也就是讓駐在國外的間諜在很好的掩護之下與蘇聯沒有明顯的連繫。「V」處——「行動處」在「濕性業務」之下從事恐怖主義、綁架及暗殺，在一九六九年該處也經重整擴編過，並更名為「S」管理分局第八處，其任務從此便著重於破壞外國的通訊系統、交通和公共設施。^⑯

在所有十一個地理區處之中，第一處的責任是最典型的一個。它負責督導其在華盛頓的蘇聯大使館、紐約的聯合國代表團，及在舊金山的領事館內的「合法」情報站，並維持及供應主要的幕僚人員。它並督導在美國國內外收買和爭取美國政府人員、商人、學生、教授、科學家、新聞人員、俄裔難民或移民及觀光客等。同時它還處理由國際共黨陣線組織所發動的反美活動。總之，該處所負的全盤責任是：（一）以間諜滲透美國政府；（二）在國會、新聞界、商界、勞工界及大學校園內發展影響力代理人；（三）暗中破壞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利益。^⑰

四、「國安會」在美國活動的指導綱領

西方的一個安全單位已獲得了一份被國安會列爲最高機密的訓練手冊——「在美國和第三世界招募美國人的方法」。這份手

註^⑭ John Barron, *KGB: The Hidden Hand* (New York: Reader's Digest Press, 1983), pp. 444-451.

註^⑮ U. S. Congress, 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Hearing on Soviet Active Measures*, 97th Cong., 2nd Sess., 1982, p. 235.

註^⑯ Raymond Palmer, *The Encyclopedia of Espionage: The Making of A Spy* (London: The Danbury Press, 1977), p. 22.

註^⑰ 同註^⑮，頁七九。

冊是經第一總局首長們認可的。

它裏面明白記載了國安會在美國最重要的目標；詳述了國安會所習慣雇用及招募美國人的方法；並且提到了國安會在企圖收買美國人時可能遭遇到的問題。

爲舉例說明招募方法，該手冊的作者重新整理了國安會在美國許多實際的行動，並用假名偽裝了許多涉及行動的人名，也省略了國安會人員的名字，和改變了場所及機構的名稱。

因爲蘇聯的情報單位常要藉助於間諜網取得他們最感興趣的機密資料。所以這種在主要敵人的國家內佈建間諜網可說是蘇聯情報最重要的工作。同時，該手冊的作者希望這份教材能對他們的情報人員，尤其是對於那些正在執行反美情報工作的生手們確實有幫助。^⑭

甲、在美國招募活動的原則

對於蘇聯駐美的情報站來說，發展強大的間諜網以獲得美國政府機密的軍政計畫資料、科技方面的新發現或新發明、美國情報與反情報單位工作資料、以及設在美國之國際組織的資料等是最優先的工作，因此，國安會間諜的行動目標就是針對著以下這些單位：

- 一、 白宮和國家安全會議；
 - 二、 國務院、國務院在紐約的辦事處、在聯合國的代表團，及其護照簽證單位；
 - 三、 五角大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北約組織駐美常設軍事代表團，和三軍各獨立及混成單位；
 - 四、 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總署，和聯邦調查局等情治單位；
 - 五、 國家製造者協會，對美國政府有直接影響的獨占事業單位和銀行；
 - 六、 美國各主要政黨的總部及其他有影響力之大眾組織或政治組織，如：商會、青年組織、記者組織等；
 - 七、 外國駐美外交及商務代表團、聯合國秘書處，和外國駐聯合國代表團。
- 由於國安會情報站需要透過有情報潛能和有充分而強烈動機的美國人之協助，以達成其對人員招募工作的目的，並進而使這些美國人能與蘇聯國外的情報單位合作，所以蘇聯情報站對以下這幾類人較感興趣：
- 一、 在各項資料上均無瑕疵的政府公務員；

註⑭ 同註⑩，頁三四六。

二、因工作或興趣而經常觸及國家機密的非官方人員，如：記者、專門技術公司的職員、外僑代表，或外國情報人員；
三、曾接觸過科技、經濟等機密資料的私人公司職員；
四、極有可能參與政府機構的人，如：即將畢業的學生；
招募原則的正確運用，對招募工作之發展能否成功是很重要的。爲了確保招募工作能成功地發展，對政府人員、科學家、專門人員及商務代表的招募原則是：

- 一、同情蘇聯的人；
- 二、對美國政府加諸其公僕之嚴厲政策感到不滿的人；
- 三、對假美國政府之名却以控制爲實的大型獨占事業所做之支配方式感到不滿的人；
- 四、能提供真實可用之資料但有財務困難的公務員，或甘冒失去工作危險而提供重要資料的人；
- 五、有意出賣公司技術性機密給俄國人的專門人員；
- 六、有意和蘇聯代表建立科學研究契約的科學家；
- 七、爲了酬金而遞交技術資料、藍圖及新產品的人；
- 八、有意與蘇聯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貿易的人。特別是對那些大型而有決定性的貿易感到興趣的人。^⑭

乙、招募發展的初步階段

由於美國反情報組織的積極行動，使得蘇聯情報官員都會慎重考慮任何招募活動發展的初步階段。因此，國安會駐美的情報站常要求其情報人員花費很大的精神去學習美式的待人處事之習俗和方法，以便能和美國人建立起有用的聯繫與個人關係。從以往所獲得的經驗，可歸納其招募方式如左：

- 一、展開招募是從一個既認識國安會人員又認識被招募者的中間人開始的，若覺不妥，情報官員會親自執行招募工作。
- 二、情報人員或間諜網會先根據所蒐集到有關被招募者及其情報潛能之資料來進行招募。要是有情報官員參與其中，那麼根據這些資料所設計的特殊方法則應使被招募者成爲間諜。

三、當被招募的美國人在開展工作之時，情報官員是不參與的。
這些對被招募者的觀察、評估、取決及完成工作，也是蘇聯駐美情報單位的主要部份。^⑮

註⑭ 同註⑩，頁三四七、三四二。
註⑮ 同註⑩，頁三五二、三五九。

丙、招募活動的發展

和被招募的美國人進行多次關於意識形態的交談，將更易使他願意幫助、支援、或參與國安會的工作。蘇聯情報官員要趁特定美國人主動表現意願的時機，以既定的方式去發展他們之間的關係。例如：

- 一、當一位美國人向蘇聯情報單位表示想要協助，但不想讓其周遭的人或地方當局知道時，情報官員就要把握時機。
- 二、情報官員必須要瞭解，和一位美國人建立秘密關係時，只是建立情報關係的一項步驟，不應該讓理會蘇聯情報機構的眞正意圖。

一旦和該特定人物之關係發展並鞏固之後，便要與此人的家屬建立起有利的關係。由經驗得知，在發展的早期階段，情報官員應儘可能去拜訪這個人的家庭，因為結識女主人，往往有利以後情勢的發展，一來可以充實該對象人物的個人資料，二來可有助於情報官員決定如何發展與加強與此人的關係。若想利用他的妻子與他進一步發展關係時，應先要看她對他的影響力及傾向。然而，絕不應該讓她知道蘇聯情報官員的目的，因為這樣可能會產生副作用。

在美國進行招募活動時，必須考慮到特殊的活動環境，例如：

- 一、美國反情報單位會透過大規模的情報網，在蘇聯情報機構感興趣的設施及目標附近，施以封鎖，使蘇聯情報人員不可能接近。
 - 二、美國對付蘇聯駐美情報單位之反情報運作方式和經驗的資料之實用性。
 - 三、美國反情報單位廣泛散佈有關蘇聯情報人員利用當地美國人發展其招募對象之方法和步驟的資料。
 - 四、美國反情報單位對蘇聯情報官員在改變個別方法或步驟時的快速反應。
- 因此，蘇聯招募者和一位美國人建立友誼的能力，常會對他的招募工作有很大的影響。^⑩

五、「國安會」在美國的活動機會

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就成了蘇聯的「頭號敵人」，也成了最重要的情報蒐集和進行隱密活動的目標。國安會在蒐集秘密時，往往是藉著隱密的活動，同時也依靠那些時常和國安會間接接觸的「蘇聯之友」。當共黨同路人在進行宣傳及秘密

註⑩ 同註①，頁三五九—三七〇。

活動時，國安會也會另外透過媒體的佈置和影響力代理人去進行同性質但經過協調的活動。

在「美蘇友好」、「和平共存」及「和解」時期，蘇聯的情報工作做得最成功。反之，當處於「冷戰」及美蘇態度強硬時期則會遇到較大的困難。在困難之時，他們常須依賴「傭兵」。他們也經常會利用有異議的共黨份子當間諜：在最近幾年，他們就以古巴的情報單位去利用那些新左派份子和「極端派」份子。^②

甲、從一九五〇到一九七〇年

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蘇聯在利用美共從事情報工作時，曾遭遇很大的問題。由於人員的損失，蘇聯人不得不依賴「傭兵」及一些被他們脅迫去當間諜的人。但不可否認的，曾獲得當初若干富有理想主義而且思想行為忠誠於共產主義的美共份子的幫忙。有不少的案例說明，蘇聯的情報活動並非一帆風順和無往不利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經常破獲蘇聯所招募的間諜和他們所收買的情報。例如：一九六〇年五月，該局所發表的一份名為「揭發蘇聯間諜」的報告，文件所記皆為蘇聯外交官如何接觸誘餌的案例。^③

對具有敵意的外國情報機構來說，美國一直是個令人愉快的獵場。美共及其外圍組織一直充當國際共黨的宣傳機器，經常對蘇聯提供情報傭兵，也不斷地為蘇聯及其附庸的情報機構製造不同的新機會。新左派和極端派份子也是有意或無意地、直接或間接地成了蘇聯情報機構的支持者及資產。例如，七十年代的反越戰份子就是蘇聯情報機構的主要目標，藉著「愛好和平」，他們成爲被蘇聯利用的工具。在越南「越南化」和水門事件之後，這些反戰者對美國都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④例如：蘇聯國安會的問題柏契特 (Wilfred Burchett)，於五十年代曾在北韓參與對美軍戰俘的洗腦工作；廿年後，搖身一變成爲美國新左派報紙保衛者 (*Guardian*) 的外國通訊記者。^⑤

乙、在聯合國的「國安會」人員

註^⑥ Roy Godson, *Intelligence Requirements for the 1980's*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Center, Inc., 1980), pp. 161-162.

註^⑦ 同註^⑥，頁一八一。

註^⑧ 同註^⑥，頁一八三。

註^⑨ 同註^⑥，頁一八五。

蘇聯「國安會」在美國的情報活動

一九七九年，聯合國蘇聯籍的副秘書長謝夫成柯 (Arkady N. Shevchenko) 向美國投誠之前，曾在九月廿四日對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BBC) 揭露：聯合國和蘇聯駐美大使館一樣，都是蘇聯主要的間諜基地。在紐約所駐紮的三百名國安會人員之中，有一位還是前秘書長華德翰 (Kurt Waldheim) 的特別助理列雪夫斯基 (Victor Lesiovsky)。^②

一九六七年，當安德洛波夫擔任國安會主席時，紐約地區的國安會人員雀躍之情溢於言表，因為「我們終於有一位強人當我們的領導人了。」^③

國安會人員在聯合國內不但隨時可以找個理由不上班，而且也經常在上班時間外出。他們曾說：「情報工作才是我們在紐約的最高優先。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在此地的原因。」^④同時，他們在外出時還常常要求他國的外交人員施惠，讓他們搭便車以躲過美國情治人員的盯梢；^⑤或是去賄賂和勒索別國的外交人員為他們工作。由於他們已混進了人事部門，所以任何人在未報到上班之前，他們都已掌握了資料，而後就找那些可供利用者，從上班的第一天起就可能為國安會工作。^⑥每天早上，他們總會收到莫斯科拍來的指示和一大堆的問題，所以時常可見到他們在各個走廊上向別國人員提出詢問，進行逐項的「採購」。^⑦另外，莫斯科每年會對國安會駐美人員分發若干次「明細表」，詳細列出蘇聯所需要的美國產品，或要他們去查出正在科學研究地區研究及發展的東西。這些「明細表」往往長達一百餘頁。^⑧

丙、「國安會」的電子情報戰

在五十年代時，蘇聯駐美情報站只有三、四位通訊員，他們的裝備也只是裝設在某一位官員寓所的閣樓上。但到了七十年代，無線電專家不但增加了數倍，連設備也幾乎佔滿了兩個大花房，並且限制非通訊人員的進入。如今在華府東北方的河谷 (Riverdale) 市，蘇聯人員所住的公寓屋頂上，都是天線林立，用來偵聽美國的通訊和向蘇聯傳遞電訊。^⑨

註① 同註②，頁一八八。

註② Arkady N. Shevchenko, *Breaking with Moscow*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5), p.235.

註③ 同註②，頁二四二。

註④ 同註②，頁二四三。

註⑤ 同註②，頁二四七。

註⑥ 同註②，頁二四四。

註⑦ 同註②，頁二四五。

註⑧ 同註②。

此外，蘇聯以最便宜的價格買下的哥倫比亞特區的粵圖丘（Mount Alto）頂作爲新建的蘇聯大使館所在地，該地海拔三百五十英尺，從那裏可以環顧俯瞰整個華府地區。於是國安會就在占盡地利之下，把進出華府地區的所有通訊聽得一字不漏。他們使用雷射光束監聽設備，不但大華盛頓地區的白宮、國務院、五角大廈、商務部、各聯邦機構及各國駐美大使館都逃不出蘇聯大使館的「順風耳」，連在它西北方波多馬克河對岸，維吉尼亞州喬治華盛頓紀念公路邊的中情局總部的一部份也被籠罩在他們的監聽範圍裏。②華府是如此，舊金山的蘇聯領事館的屋頂上也是如此。③如今他們又把這電子情報戰的地利模式搬到了澳大利亞的首都坎培拉（Canberra），自然又是成果豐碩。④

就因爲俄國人在電子情報戰上占了上風，雷根總統便不得不簽署「國家安全決策指令」，並花去一筆龐大的經費去重新「保護」華府地區政府官員、聯邦機構及國防工程承包公司等所使用的數百萬條的地下電話纜線。⑤

丁、「國安會」的偽情報

雷根總統曾說，「美國所面臨的挑戰之一，就是美國需要對抗那些曾接二連三地威脅美國社會和國內外利益的間諜活動，並改進美國的情報蒐集能力」。他說：「蘇聯集團和其他具有敵意的情報組織在最近幾年又增加了數量和複雜性。……除了偵察我們敏感度高的機密，竊取我們所依賴的高科技之外，他們還加強了所謂的『積極措施』：以宣傳和偽情報來欺騙、誤導西方的政府和人民，以顛覆、偽造文件和隱密活動來製造西方社會的不安。」⑥

蘇聯人所用的「積極措施」，其實就是一種廣泛的欺敵技術及外交策略，用以達成蘇聯外交政策的目的和暗中破壞那些反蘇的行動。它的運用方式包括有：影響力代理人、偽情報、偽造及秘密電臺。除了情報單位之外，蘇共中央的國際部和國際新聞部也在廣泛地活動。儘管他們把這個工作分得很精密，但目的則是一致的：（一）永遠要進行意識形態的鬭爭；（二）與敵方談笑之際，要讓對手認爲蘇聯早已放棄了意識形態；（三）不論是直接或迂迴，總要讓對方信服蘇聯的誠意而樂於爲蘇聯效勞。因此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珍·寇克派翠克稱這種幫助蘇聯者的心態爲：「不信恐佈的意願。」⑦

②③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8, 1985, p. A 12.

④⑤ *Insight*, February 16, 1987, p. 14.

⑥⑦ *Pacific Defense Reporter*, October, 1987, pp. 16-20.

⑧⑨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2, 1985, Sec. 4, p. 21.

⑩⑪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21, July 8, 1985, pp. 865-866.

⑫⑬ Brian D. Dailey & Patrick J. Parker, ed., *Soviet Strategic Deception* (Lexington, MA.: D. C. Heath and Co., 1987), pp. 23-57.

曾經擔任過捷克偽情報處副處長的畢特曼 (Ladislav Bittman) 在投奔西方後所寫的一本書中，用圖示說明了國安會散布偽情報的方式：(一)行動者透過不知情的代理人間接地傳給敵方；(二)行動者先傳給敵方，再傳給不知情的代理人，而後又讓這代理人傳回給敵方；(三)行動者直接傳給敵方；(四)行動者同時把偽情報傳給敵方和不知情的代理人，而後再由他們彼此互傳給對方。^⑳有關蘇聯偽情報戰的細節，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曾在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九日予以公開。它寄了一份中情局的報告給所有的議員。報告指出：從二次大戰結束以後，蘇聯就不遺餘力地進行反美宣傳，到一九七九年美國因蘇聯入侵阿富汗而拒絕批准第二階段限武條約時達到最高峯。另外蘇聯也製作了大批的偽造文件，除了破壞美國與盟邦之間的關係外，還說美國與恐怖主義有關，這項說法在一九七八年義大利前總理莫洛 (Aldo Moro) 被刺時流傳甚廣。中情局還指出：蘇聯國安會的專家不但是精製偽造品的高手，更也是模仿美國官員簽名的大師。^㉑

戊、「國安會」的第一目標：高科技

蘇聯對美國所發動的間諜攻勢，沒有一件戰利品要比獲得美國的高科技更有價值。由於這些高科技可以挽救蘇聯的經濟停滯，並保持和美國武器競賽的優勢。蘇聯就對美國幾十萬從事國防與科技工業的人員下手。事實上，由於「走捷徑」行動的成功，已幫助蘇聯每年省下了將近一百卅億美元的研究費用。^㉒

位在北加州有兩千兩百家電子公司的矽谷，是美國的高科技之鄉，早已成了蘇聯間諜的第一目標。

儘管美國的聯邦、各州和地方政府都在近幾年展開行動防止間諜掠奪行爲，但美國各級官員都承認蘇聯還是能透過間諜網取得他們所需要的各項電子零件。尤其可怕的是，只要任何一件新的電腦晶片產品在矽谷出現，一週之後便到了俄國人的手上。而每次只要是舉辦任何有關半導體等最新電子產品的商展，至少有五十名蘇聯間諜在會場同時展開行動。^㉓

如今國安會又把箭頭對準了麻省理工學院 (MIT)、卡內基——梅隆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通用公司、波音公司、洛克希德公司和洛克魏爾國際公司。他們活動的獨特方式之一是，在大學的佈告板上招聘學生，付給學生研究費爲他們做研究。^㉔另外

註⑳ Ladislav Bittman, *The KGB and Soviet Disinformation: An Insider's View* (McLean, VA: Pergamon-Brassey's International Defense Publishers, 1985), pp. 50-52.

註㉑ *U.S. News & World Report*, March 3, 1980, p. 68.

註㉒ *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ust 12, 1985, p. 33.

註㉓ 同註㉒ - p. 38.

註㉔ *Insight*, August 24, 1987, pp. 34-35.

，他們也設法和這些有名大學的科技教授們建立和保持個人關係，透過這些教授去找資料、雇用人員，或參觀工廠、實驗室及研究中心等地都要方便得多。^④

藉由合法組織及身份的掩護，蘇聯把到手的科技產品在不需要出口證照的情況下運往歐、亞等國後，再轉口到蘇聯境內。^⑤當國安會的陰影籠罩在美國東西兩岸的情況下，前任國防部長溫柏格感慨的說道：「只要有一塊錢花在保護科技的措施上，就能讓每位納稅義務人節省至少三百五十元的國防支出。」^⑥

己、「國安會」的滲透

國安會在蘇共的授意下，對美國國會及情治機構的滲透未曾中斷或鬆懈過。蘇聯的外交官和新聞記者經常是大大方方地參加國會的聽證會，蒐集資料，甚至與國會裏的工作人員一起討論問題，套取情報和招募人員。例如，凱帕斯（James Kappus）和陶立渥（Keith R. Tolliver）就是被聯邦調查局策反之後答應擔任雙重間諜的。原來，凱帕斯是衆院軍事委員會歐康斯基（Alvin E. O'konski）衆議員的助理，而陶立渥是依斯蘭（James O. Eastland）參議員的助理。國安會令他二人竊取檔案中的秘密資料。^⑦

前中情局長透納上將（Adm. Stansfield Turner）曾說，目前金錢已取代了以往的意識形態及理想主義成爲美國人願爲蘇聯擔任間諜的主要動機。財務的困難和金錢的誘惑，使得美國反情報單位更難抓到叛國者及爲蘇聯工作的雙重間諜。^⑧曾投誠美國之後又重返蘇聯的情報官員尤爾成柯（V. S. Yurchenko）和美國高級情報官員討論蘇聯的間諜技術時，親自告訴五角大廈安全委員會主席李察史迪威將軍（Gen. Richard Stilwell）說，大多數爲蘇聯擔任間諜的美國人都是「志願」的。^⑨

例如：前中情局人員坎派爾斯（William Kampiles）出售衛星技術手冊；波伊斯（Christopher Boyce）和安德烈李（Andrew Lee）因沉溺毒癮而出售高度機密文件；田奈特（David H. Barnett）因辭職後經商失敗而求助於國安會；^⑩艾德華

註④ Harry Rositzke, *The KGB: The Eyes of Russia*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 Co., Inc., 1981), pp. 188-190.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同註④, p. 37.

註⑦ 同註④, pp. 187-188.

註⑧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85, Sec. 2, p. 13.

註⑨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 1985, Sec. 1, p. 27.

註⑩ *U. S. 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29, 1984, pp. 38-39.

霍華德 (Edward L. Howard) 在被懷疑出售情報給蘇聯後，以中情局所傳授的隱藏術躲了一年，竟而獲得蘇聯的政治庇護。^④同時由於霍華德的倒戈，蘇聯情報員托爾卡契夫 (Adolf Tolkachev) 被控為美國擔任間諜而遭槍決。^⑤除了中情局這個大目標之外，國家安全總署、聯邦調查局、武裝部隊的各單位、國防工程承包公司、國家檔案局，無一不是國安會要滲透和獵取情報的對象。

儘管從一九七〇至一九八七年間，美國公開驅逐了卅三名「不受歡迎的」蘇聯外交人員，^⑥但根據紐約時報的統計，這個數字太過於保守了。資深的政府官員說，反情報機構的人手根本不足以應付將近兩千六百名蘇聯駐美人員中已被確認的五百到六百名情報人員。目前負責監視這些蘇聯間諜的聯邦調查局人員據說不到四百名。^⑦因此雷根下令要更廣泛地使用測謊器，以測驗在政府機構中接觸過機密文件的行政官員。^⑧而且參議員杜爾 (Sen. Bob Dole) 和另外四位共和黨籍議員提議，恢復對平常時期犯下間諜罪的百姓及軍人處以死刑。^⑨可是極為諷刺的是，前國防部長溫柏格却指出，蘇聯國安會人員正在受訓學習如何使測謊器失效。^⑩

六、結 論

國安會在海外的部署，除了蘇聯駐各國的大使館、公使館、領事館、代表團、辦事處、新聞通訊社、航空公司、旅行社之外，在非共國家的共產黨團、工會、商會、青年組織、宗教團體，以及和平運動組織中也建立起或縱或橫的聯繫，因此，有人說蘇聯的國安會應算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不平常的現象之一。

因為它的空前龐大和無所不在，又因為它具有很大的神秘感，所以要想對它的重要性產生一個精確的觀念並非易事，自然地

註④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1986, Sec. 1, p. 1.

註⑤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1986, Sec. 1, p. 11.

註⑥ Expulsions of Soviet Officials, 1987; *Foreign Affairs Note* (Washington, D.C.: U.S. Dept. of State, 1988), pp. 4-5.

註⑦ *New York Times*, June 16, 1985, Sec. 1, p. 1.

註⑧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1985, Sec. 1, p. 1.

註⑨ *New York Times*, June 15, 1985, Sec. 1, p. 46.

註⑩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1985, Sec. 1, p. 23.

，對它的規模和能力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⑤

蘇聯不斷地接近西方的科技，已促使雷根政府欲設法解決這項令人頭痛的問題。國務院雖在重新審核技術移轉蘇聯的政策，但是美國商人在戈巴契夫實施對外經濟新政策之後，亟想到蘇聯去簽約投資。事實上，雷根當政之後，聯邦調查局的預算已經增加了三倍却仍感力不從心。一位中情局的官員說，最厲害的間諜就是這些富毅力又具有意識形態的間諜。^⑥要想對付他們，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一)反情報專家透過傳播媒體和愛國教育，並公開「國安會」的招募方法與行動，以教導大眾保護他們個人與國家的資產；(二)設法讓蘇聯駐美外交人員之數目與美國駐蘇的外交人數相等，並限制蘇聯人的行動範圍；(三)立法保護國家機密和嚴懲洩密者。如此，或可減少或降低「國安會」的間諜活動。

註^⑤ David J. Dallin, *Soviet Espionage* (New Haven, M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493.
註^⑥ 同註^⑤·p. 194.

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名錄

本書係將中共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副秘書長及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共廿七人之人事資料編纂而成，背景及經歷完整，為查考、研究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不可或缺之工具書。
本書約五萬字，廿四開本平裝。實售新臺幣一百元（國內郵購加郵掛費十三元五角）。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地址／臺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四號
電話／九三九九二一轉二二六·二二七
郵撥／〇〇三三四三六一二號
戶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